

天注定，窮人要做好僕人本份（「職業倫理」），貴賤有份，不要妄生非分之想。對林女士的不自覺欣賞，表明作者對體制的反思僅止於詛咒體制給自己所屬階層帶來的傷害，而非對體制本身的挑戰與反省。

說到底，《往事》缺乏真正的歷史反思。實質上，它是魯迅批評的那種以計較個人利害為原動力的控

訴式表達。作者對知識份子「聖像」的塑造以及她所依附的自由主義反體制策略，皆需深刻反省。迄今為止，中國並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百年來西方的自由精義，不過如一顆被風吹起的種子，並未在中國權力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中國知識份子若欲成為「真正的知識階級」，恐怕還有漫長道路。

現代知識份子的出與處

● 夏兆輝



耿傳明：《周作人的最後22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周作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巨石重鎮」（鄭振鐸語），同時又是一個複雜而具有爭議性的人物。他擁有雙重身份，既是叛徒

又是隱士，既是文人又是「督辦」。正是由於周作人身份和思想的複雜性，他才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界和思想界一個富有活力的話題。關於周作人的傳記已有多種，如錢理群的《周作人傳》、倪墨炎的《中國的叛徒與隱士——周作人》、李景彬等的《周作人評傳》、雷啟立的《苦境故事——周作人傳》等，但耿傳明的《周作人的最後22年》（以下引用只註頁碼）有其獨特的學術價值。

從時間來看，作者敘述了周作人生命中最後二十二年（從1945年日本投降到1967年去世）的心路歷程；從手法來看，作者採用「以史傳人」的方法，把傳主放在更大的社會網絡中進行考察，透過時代去觀察人，通過人來反映時代的變遷；從內容來看，除了運用大量的史料來為時代作注解之外，作者還把周作人放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轉型中來審視現代知識份子的思想文化心態，分析他自身的文化性格對後來

周作人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人物。作者把他放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轉型中來審視現代知識份子的思想文化心態，分析他的文化性格對後來「附逆」的影響，並通過解讀其舊體詩中的佛典來探析他的心態。

早期周作人以思想文化精英姿態出現，後來卻肯定知識份子對人民的依附性，對個人主義進行批判。其思想言論的前後矛盾，反映了現代知識份子在中國走向現代化進程中價值觀念的錯位。

「附逆」的影響，並通過解讀周作人舊體詩中的佛典來探析他的心態。

真實性是傳記文學的生命和靈魂。以前的周作人傳記大都是在文學史、思想史的範圍內為其作傳，試圖將周作人從其所在的社會歷史環境中抽離出來，探討其所代表的「純文學」或「純思想」的價值和意義，這是一種將周作人進行非政治化、非道德化處理的方式。這自然是有價值的，但也存在着將複雜的歷史人物主觀化、抽象化之弊。

《周作人的最後22年》則是一部側重於對現代作家的文化心態進行考察的思想評論性傳記。該書用了很多的筆墨來敘寫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社會輿論氛圍和傳主的人際關係網。作者既把周作人和當時的純政客漢奸錢稻孫、「天字第一號」漢奸陳公博，以及和周作人互稱「宗兄」的周佛海並置，又把和他曾經處於同樣困境的老舍並置。作者力圖通過前一個人際關係網來透視周作人作為文化漢奸與純政客漢奸的不同之處，又通過後一個關係網來闡釋「自由至上」的觀念對周作人「附逆」的影響。這樣，作者為我們構建了一個活生生的歷史現場，復活了傳主生活的時代，營造了與傳主息息相關的社會氛圍。

作者力圖把周作人放在中國二十世紀現代化的進程中來思考其思想變化。周作人是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現代知識份子，曾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提出新文學的思想革命以及以個人為本位的人道主義思想，而且「早在1926年、1927年左右，周作人發表過不少激烈的『排日言論。』」（頁11）而華北敵偽政權的人物大多是文化上的守舊者，但

周作人在盧溝橋事變後卻與他們成了「同僚」。現代知識份子在�來政治的壓力下，從一個反叛傳統的個人主義者和現代化的推動者退化為一個外來侵略機器的「工具化」部件。周作人在〈中國的思想問題〉和〈中國文學上的兩種思想〉中試圖對儒家文化進行現代化，賦予儒家文化以西方現代人道主義思想和民主主義的內涵。從「附逆」期間寫的〈日本之再認識〉和〈關於祭神迎會〉可以看出，周作人試圖以儒家文化中心論來同化日本文化。但他這種理想在強大的外來侵略戰爭的政治環境下，只能化為泡影。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新的階段。在新的時代裏，周作人的價值觀念又有了新的變化。我們知道早期周作人是以思想文化的精英姿態出現的，「但現在不同了，群眾已成為了歷史的勝利者，是知識份子欽定的學習對象。歷史早已證明了知識份子的失誤，所以周作人也順應風氣，轉向了對知識份子的批判。」（頁185）他在〈文人與吹鼓手〉中強調向人民學習的重要性，肯定知識份子對人民的依附性，並且對個人主義進行批判，認為個人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脫離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這種思想言論的變化完全呈現為一種前後矛盾的曲線圖，正是這種矛盾反映了現代知識份子在中國走向現代化進程中價值觀念的錯位與顛倒和內心思想的堅持與動搖，從而彰顯了人性的複雜與多面。

《周作人的最後22年》極力營造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與周作人「共在」的一切，其目的之一是在宏大的時代背景下全面審視周作人，但

更深層的目的是以周作人為中心線索，思考現代知識份子與現代化進程的關係，反思中國現代性的歷史進程，探索知識份子的價值理念、文化心態和整個時代，以及世界化的民族國家形成之間到底是怎樣一種複雜曲折的關係。

現實中的周作人應該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他的性格和思想是複雜的、動態的、立體的，而不是簡單的、死板的、平面的。寫傳記的人要做到這一點，除了掌握翔實的資料外，更重要的是要持有客觀公正的態度和獨立的立場。周作人和魯迅是同胞兄弟，但二人的性格卻有很大的不同，魯迅冷峻和深刻，周作人則是沉靜和閒適，並且帶有一點清高和孤傲。作者用不少史料佐證了周作人的自私心重和責任心薄弱，比如魯迅去世後周作人的冷淡反應。當他母親說要依靠他來養老時，周作人回答道：「我苦哉，我苦哉……」（頁66）

作者進一步分析了周作人懦弱和自私性格的形成與其家庭結構的關係。當日本佔領北京城後，他卻以「上有老、下有小、家累重」為由，決定留在北京；而同時代的文人老舍卻不怕千辛萬苦，冒着生命危險踏上流亡之路。應該說周作人的「附逆」與他這種自私和軟弱的性格有很大關係。周作人這種自私、偏狹和迂執從本質上說是由其「極端自由主義」思想所決定的，其「自由至上」和「個人至上」的觀念決定了生存理性凌駕於一切價值之上。「周作人完全拒斥諸如此類具有剛性和正氣、富含『鈣質』的精神食品，也就極易患上一種文化至上的『軟骨症』，他後來的附逆也就不那

麼不可理解了。」（頁82）周作人在五四時期是一個叛徒，以人間本位主義為武器炮轟封建專制，對「人」有着深刻的思考，後又轉向「自己的園地」，追求趣味的人生，而當民族國家陷於苦難之際，他又把「道義之事功化」作為自己的生存哲學，為的是「苟全於亂世」。

周作人的悲劇是二十世紀中國極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悲劇的一個縮影，當這種個人至上的觀念和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發生衝突時，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正如作者在書中寫道：「很難想像一個對自己的民族、國家、固有傳統缺乏起碼的溫情和敬意的人，會成為一個『愛國者』。」（頁82）這體現了作者對現代知識份子的反思。因為從積極意義而言，愛國總是需要有所附麗的。無疑個人主義是解構傳統專制主義文化的一把利器，但是歷史上的個人主義仍是在民族國家範疇之內發揮其積極作用的，超出了這種範疇之外的個人主義則更多的表現出其負面性。「附逆」後的周作人實際上已談不上是一個積極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者，只是一個生存至上主義者而已。

如何處理傳主的作品，也是傳記寫作的一個重要問題。周作人的舊體詩是學術研究的薄弱環節，特別是帶有佛典的舊體詩，作者將它們視為揭示周作人內心世界很重要的史料。周作人年輕時便與佛教結緣，據他自己回憶，在南京水師學堂讀書時便讀了《楞嚴經》、《諸佛要集經》、《投身飼餓虎經》等書。據《魯迅日記》，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碧雲寺住院時曾讀過大量的佛經。在此期間，魯迅曾為他提供了

當個人至上的觀念和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發生衝突時，周作人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附逆」後的周作人實際上已談不上是一個積極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者，只是一個生存至上主義者。

《周作人的最後22年》開闢了一個審視周作人的新視角，從他帶有佛典的舊體詩來透視其「附逆」後的心態。他在詩中一再引用佛典說明自己的「附逆」不是叛國而是不循俗理，是「勇入地獄」，「解民倒懸」。

《佛本行經》、《起世經》、《樓炭經》、《梵網戒疏》等十幾種佛經。周作人曾在北京大學開過六朝散文的課，後又想開佛典文學課，只是後來由於盧溝橋事變而擱置。既然能開這些課，我們可以看出周作人對佛學有很深的造詣。

可以說佛經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對周作人的生命意識和價值理念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五十自壽詩》中他寫道：「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着袈裟。」關於周作人與佛教的關係，很多學者從不同的方面作了研究。有學者認為佛教文化對周作人的人道主義和個人本位思想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還有學者對佛教文化與周作人散文創作之間的關係做了研究。而《周作人的最後22年》開闢了一個審視周作人的新視角，就是從他帶有佛典的舊體詩來透視其「附逆」後的心態。

書中共列舉了三十首舊體詩。在周作人被押解去南京的途中，他抄錄了1942年的一首舊體詩：「年年乞巧徒成拙，烏鵲填橋事大難。猶是世尊悲憫意，不如市井鬧盂蘭。」被押解前後創作的是：「羸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窮究可哀。誓願不隨形壽盡，但憑一葦渡江來。」(頁38)還有一首是寫給日本侵略者的：「當日披裘理釣絲，浮名贏得世人知，忽然悟徹無生忍，垂老街頭作餅師。」(頁109)晚年曾作詩贈周甲甫：「打架妖精未是慙，任他遊戲與心安。摩登伽女如相遇，玉體橫陳取次看。」(頁232)這幾首詩都引用了佛典，如「鬧盂蘭」、「羸提」、「無生忍」、「摩登伽

女」等。作者解釋說「盂蘭盆節」來自佛經中目蓮救母的故事；「羸提」即「忍辱」的意思。

周作人始終沒有為自己的叛國行為進行過懺悔，反而時時刻刻都在為他的變節做辯護，他在詩中一再引用佛典說明自己的「附逆」不是叛國而是不循俗理，是「勇入地獄」，「解民倒懸」。如果不懂周詩中的佛典，有時確是無法領會周的「深意」。如以下一首詩：「粥飯鐘魚非本色，劈柴挑擔亦隨緣。有時擲鉢飛空去，東郭門頭看月圓。」(頁107)該詩的關鍵是「擲鉢」一詞，這裏是不能從字面來理解的，「擲鉢」是一典故：黃山有擲鉢峰，相傳昔日有孽龍在此居住，常出為人害，山洪暴發之禍更是牠的傑作。有神僧擲鉢將牠罩住，從此害絕，而峰和禪院遂以擲鉢而聞名。明陳恭《黃峰三十六咏》鉢孟峰云：「尊者西來救世濃，婆心曾不計餐饗，鉢孟一擲高峰後，麻水從無說毒龍。」如此，這位「在家和尚」的出山，就是為了降妖捉怪，拯救世人，以求得花好月圓的太平時世了。這首詩絕佳地揭示出周作人「附逆」後是如何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合理化闡釋的。

耿傳明的《周作人的最後22年》以傳記的形式為我們提供了審視周作人的新視角。作者把他置於開闊而複雜的歷史文化語境和中國現代化的整體進程中來考察，通過對傳主帶有佛典的舊體詩的分析，深入剖析了現代知識份子秉持的價值理念與時代、民族國家建構的複雜關係，推進了周作人研究的深入，也為我們研究二十世紀知識份子心靈史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